

青
島
史

研
究

●五四运动与
青岛问题 ●

青岛市青年运动史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青岛市委青运史办公室 编

2

青岛青运史研究

二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青岛市青年运动史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青岛市委青运史办公室 编

1988年10月

前 言

青岛团市委副书记 张泽忠

2004年8月8日

1914年，当日德之间为争夺青岛而大动干戈时，恐怕谁也没有料到这次战争会导致一场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由“青岛问题”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起青岛的命运。“巴黎和会”上列强肆意出卖中国利益的举动终于激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我青岛”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精神旗帜……。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青岛团市委组织力量撰写了此书，由青岛市博物馆江德钧主笔。本书从青岛历史角度出发，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艰苦的史料收集工作，从中摘取了近二百种中外文史料，将1897年至1922年德国与日本占据青岛期间有关“青岛问题”的成因与演变过程进行了全面叙述，其中对“胶州湾事件”、“日德青岛之战”、德国与日本在青岛及山东各地的殖民开发以及与此有关的“廿一条”、“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等，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历史事件都作了较完整的论述。由此剖析当时出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错综复杂的远东国际关系的内在动因和客观规律性，以助于我们在了解青岛历史的同时也加深对轰然而起的“五四”运动的内在根源、社会背景及其

伟大功绩的认识，从而培养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继承发扬“五四”精神，更好地投身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在即将付梓之时，谨向为此书的完成做出热情帮助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8年11月

《五四运动与青岛问题》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德国在青岛的早期殖民开发	(1)
第一节 青岛—诱人的“金苹果”	(1)
第二节 胶州湾事件	(4)
第三节 德国的殖民开发	(6)
第四节 来自青岛的“军事威胁”	(12)
第二章 远东战争机器—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	(16)
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16)
第二节 远东列强争斗的黑幕	(22)
第三节 德日矛盾的演变与激化	(25)
第三章 日德青岛之战	(32)
第一节 远东战幕的拉开	(32)
第二节 “瓮中之鳖”	(39)
第三节 山东“新霸主”—日本	(41)
第四节 青岛易主	(46)
第五节 战争带来了什么?	(48)
第四章 “独霸”阴谋与“青岛問題”	(55)

第一节	威压下的“廿一条”谈判	(55)
第二节	日本的暴发与对华政策的变化	(65)
第三节	列强对日的妥协、纵容	(68)
第四节	借款背后的山东交易	(72)
第五章	日本在山东的殖民侵占	(78)
第一节	太阳旗下的非法统治	(78)
第二节	殖民者的开发与掠夺	(89)
第三节	山东人民的愤恨	(107)
第六章	五四运动轟然而起	(114)
第一节	众矢之的一“巴黎和会”	(114)
第二节	幻想的破灭	(118)
第三节	抵制“和约”的拒签行动	(126)
第四节	五四运动与山东	(130)
第七章	青岛的回归	(136)
第一节	日本“直接交涉”阴谋的破产	(136)
第二节	从日本独霸到列强共享的新格局	(139)
第三节	日本对山东无可奈何的“惜别”	(146)
第四节	似了未了的“鲁案”	(151)
第五节	历史的反顾	(153)
	图片12帧、地图三幅	(165)

第一章 德国在青岛的早期殖民开发

所谓“青岛问题”是指青岛及其胶济铁路沿线的归属问题，故又称“山东问题”。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被迫放弃了对青岛的占有。但是以武力强夺了青岛的日本却视其为新殖民地，大肆进行殖民经营开发，完全漠视青岛固有的主权国——中国应有的权益，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也加重了远东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终于酿成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本章通过德国侵占青岛的由来及早期开发的史实，帮助读者获得对“青岛问题”的起因有一完整的印象。

第一节 青岛——诱人的“金苹果”

青岛一名的由来，传闻曾因其前海处一个草木常青的小岛——小青岛之名而得以沿袭流传开来，德国占领时期（即1897年至1914年）泛指其所辖欧人居住区，即今前海一带，而整个“租借地”则称为胶澳，意即胶州湾水坳处。^①俟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接管统治后，定名青岛市，取代了胶澳旧称。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南端，地处胶州湾葫芦状湾口北侧，枕山傍海，形胜险要，且气候宜人，冬暖夏爽。湾内水深浪平，不冻不淤，港泊与航运条件优越，“上可瞰登、莱，下可控江、浙，盖形胜必争之地”。

青岛不仅有着舟楫之便，更有着渔盐之利。作为山东及其华北的门户，其腹地经济素来富庶，不仅盛产棉花、小麦、花生、烟叶及瓜果肉菜等农副产品、煤、铁等矿产资源也十分充裕，久为外人所垂涎。十九世纪中叶，那位揣着美国东亚教会赞助资金和德国政府津贴，七次来华“游历”调查的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冯·李希特霍芬曾预言：“只有中国蕴藏着有待于世界市场开发的其他宝藏（而）胶州海港的开放和上述与内陆连接的交通线的开拓是山东丰富的煤矿资源的前途所在”。②

青岛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远古，先民们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处处放射出智慧的光彩和纯朴的民风，数千年儒家道德的薰染，使山东百姓养育成勤劳节俭的生存习俗。然而，在长期的封建小农经济制约下，勤劳的双手并未带来富足的生活，反而呈现出地狭人稠的历史特点。本世纪初，山东人口几达三千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平均密度约为五百人，位居全国第三。③人口的相对过剩，致使劳动力雇金低廉，形成一支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在外国人看来：山东“最重要的是无穷伟大的、非常便宜的智慧的人的劳动力……外国资本将不会错过利用这个机会制造廉价的工业品以供应世界市场”④

就时代背景而言，环顾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内忧外患，连绵不断。作为统治中枢的政府，不论是清廷抑或北洋军阀统治集团，都处于衰败没落，风雨飘摇之中。对内驾驭能力与对外抗御能力都不同程度地趋向消亡，不得不反过来仰仗列强的保护而求苟全。面对如此软弱可欺的中央政府，中国成为列强施暴欺凌的对象就再也合适不过了。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洞开，列强纷至沓来。他们梦想着这四亿人口的大市场能带来无穷的利润。但是，罪恶的鸦片吞噬了有限的消费能力，封建统治者超经济盘剥，使广大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始终停留在低下水平，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在客观上顽强地抵抗着洋货的涌入。尽管列强可以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武力威摄，从软弱无能的清廷手中攫取旨在促进商品输华的各项殖民特权，但是微乎其微的市场购买力不断消蚀着他们借助商品输华以逐厚利的原始冲动，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事实，改弦易辙，注力于开发中国难以计数的天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把中国作为他们的海外工厂和经济附庸。

在这种时尚的支配下，资本输出成了侵华政策的主旋律，由此派生出来的建立殖民飞地，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来保障资本有效地输出并盈利的领土瓜分政策也就成了一支“流行曲”，视海域征服为扩张的主要手段的西方各国，无不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中国这块“净土”，青岛也毫不例外地开始失去那旧有的“安宁”了。

1861年，英舰“多布”号闯入胶州湾，揭开外舰入湾之序幕。中法战争期间，法军曾有过转道胶湾以图京畿的预谋，引起各国注目。1895年，俄国远东舰队曾来此“寄泊”过冬，认为此地“为屯船第一善埠”。次年，中国实权人物李鸿章出访俄国时，在所订“中俄密约”中许诺：“情愿将山东省之胶州地方暂行租与俄国，以十五年为限”。青岛已面临着随时被瓜分的危机。在这咄咄逼人的尘嚣声中，德国入侵者捷足先登了。

第二节 “胶州湾事件”

十九世纪末叶，德国步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经济的膨胀使之深感国内市场的局限，促使它选择了以海外武力扩张的“世界政策”来取代称霸欧洲的“大陆政策”。中国这个尚未被最后征服的亚洲大国就成了德国统治集团插足远东，抢食殖民果实的新猎物。德军参谋总长毛奇就曾直率地表示：“驱使我们开始切开中国这块大蛋糕的就是发财的欲望”。他们正在加紧寻觅着机会。

1897年11月1日，德国的两名传教士因民愤过大，在山东钜野县磨盘张庄被村民所杀，这就是历史上的“钜野教案”，它为德帝国主义伺机侵占胶州湾提供了口实。11月14日，一直游弋于中国海域的德国远东舰队奉德皇之令在青岛登岸，以武力驱赶了驻守在此的清朝驻军章高元所部，强制占据了环胶州湾地区，次年3月6日，德国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该条约片面地要求中国允诺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的既成事实，作为对解决“钜野教案”的一种交换，其主旨就在于赋予德国在青岛乃至整个山东享有保护其侨民及其利益的种种特权，以防止再出现“仇德”事件。条约规定：

一、胶州湾海面及半岛陆地（约551平方公里）为德国租借地，在九十九年的租期内“均归德国管辖”，“如德国租借未满之前自愿将胶澳归还中国，德国所有在胶澳费项，中国应许赔还，另将较此相宜之处让与德国”。租借地外圈周边百里为中间地带，两国均不驻兵，但允许德兵“任便过往”。

二、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省盖造铁路两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

同时规定：“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允准德国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中国对此应“一律优待”。

三、今后凡是山东有需借外资，聘洋员，采办洋物等项事务，德国拥有优先权。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十足的不平等条约，其要害在于：

1. 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之时，德国以武力为手段，借“租借”之名得割让之实，这无疑给列强树以示范和壮胆，也暴露了清政府对其领土无法自卫的弱点。

2. 条约给德国的投资赋予了一项保险权利，即不论投资多少，只要它感到投资盈利不尽满意时，或遇有意外情况不得不放弃原有“租借地”时，德国殖民者就可以索回投资款项并转向更具开发价值的“相宜之处”，而中国方面必须如数偿还其投资，并给予调换。这项规定使租借者毋庸担忧折本所引起的不安，甚至还可“得陇望蜀”，不断更换乃至扩展殖民场所。

3. 修筑铁路是使任何地区转化为殖民地的最便捷途径。殖民势力也正是通过铁路这一触角的不断延伸而逐渐向四周渗透的。条约所赋予德国的筑路采矿权使殖民权益的获得不仅局限于“租借区”内，而是扩展至山东全境乃至中国的腹地。

4. 由于德国握有对山东的涉外经济业务的优先权，这就为限制以致排除其它列强对山东的染指提供了依据，山东

由此论为德国独占的“势力范围”。其结果一方面德国在整个“胶州湾事件”中行之有效的“租借”方式纷纷为列强所仿效，割地狂潮由此掀起，另一方面，“势力范围”的划分又反过来加剧了远东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留下了列强冲突新的隐患。

第三节 德国的殖民开发

前德皇威廉二世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中无不痛惜地追忆：“青岛（在德国统治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引起了日本人和英国人的嫉妒，（正是这种）嫉妒促使英国在1914年要求日本占有青岛……德国在海外所从事的一项伟大的文明工作就这样被英国商业上的嫉妒心给彻底破坏了。把青岛的丢失归咎于因其‘显赫’的地位而招致英国的嫉妒，这种看法未免太‘感情用事’。但是德国十数年的苦心经营，使青岛成为一棵诱人的摇钱树，成为威胁其它列强在远东利害关系的眼中钉，从而招致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兼并掠战的结局，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威廉二世的哀叹了的。”

德国侵占青岛的初衷以及所谓的“租借”理由都是以建立军事基地为出发点的。这是因为，偌大一个中国竟无德国立足之地，这对推行“炮舰政策”的新兴德帝国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当然，狭义的军事占领就其殖民开发最终目的而言，不仅是得不偿失的，也是难以持久维系的。因此，德国侵占青岛“从一开始就具有清楚明确的目的，不仅仅是为

了占领土地，而是要参与山东省及全华北的经济与商业的开发，使青岛变成为贸易的商港”，^⑤其用意在于：以强权统治为后盾，进行基础性开发，使青岛这个以自然经济为属性的传统集散口岸转变成为适应世界经济市场竞争机制的现代化通商贸易口岸，成为联结山东乃至华北与海外航运贸易的主要渠道，从而带动殖民地的繁荣，增强德国在远东的经济竞争实力，为称霸远东提供经济后援。此后的殖民开发所形成的功能体系完全证实了这一主导思想。

帝国主义时代的德国入侵者在当时西方经济界十分风行的“历史学派”竭力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思潮影响下，对青岛的殖民开发也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来。

1. 建立以青岛总督府为中心的政权机构，颁发一系列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政策法令，以强权保障殖民权益的有效行使与推广。

如对“租借区”内土地实行产权强行转让和使用管理官有化。这不仅使租籍村民丧地而沦为自由雇佣者，又可使政府从土地炒买及征收租税中渔利，更重要的是可以根据开发需要有计划安排土地的使用，以低廉的地价吸引投资者。

再如关税制度中规定对于军需货物及有助于市政建设或殖民地经济所需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免税或减税等优惠政策，以促进城市建设 and 地方工商及加工各业。

2. 以官方补贴或盈利企业提成等方式给予殖民开发以资金援助。

据统计，青岛租借地得自德国国库补贴达162480904马克，来自当地官方税收等36499123马克，两项约为二亿马

克⑥。

对经官方特许设立的，享有《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有关特权的盈利企业，如山东铁路公司，山东矿务公司等也多有抽取部分红利贴补租借地开发之用的规定。

以1899年6月1日《德国特许山东铁路公司建筑铁路及营业条款》有关规定为例：

红利额为5—7%时，提取1/20贴补租借地；

红利额为7—8%时，提取1/10贴补租借地；

红利额为8—10%时，提取1/5贴补租借地；

红利额为10—12%时，提取1/3贴补租借地；

红利额为12%以上时提取1/2贴补租借地。

3. 利用集权统治的便利，大兴土木，创办各项公用事业，开辟适宜于资本输出的投资环境。

这期间，相继建立了自来水（1899年）、供电（1903年），市内电话（1899年）等设施，并对原有的邮政与电报通讯设施进行了改建，新增了青岛至烟台和青岛至上海的海底通讯电缆，开通了青岛经南太平洋的雅普岛（北纬9度，东经139度，）中转向欧洲的无线电报，形成了以青岛为中心，向中国各地以至海外辐射的通讯网络。

这一时期，市内修路八十多公里，郊外修路210公里，并以石质硬性路面取代了泥质软性路面，使租借区交通情况在数量及质量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4. 最集中地体现国家干预精神的莫过于从法理上特许和经济上扶助建立的金融机构和交通运输等财团，使《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上攫取到的殖民权利转换成实际上丰厚利润。这主要包括德华银行青岛分行，胶济铁路和山东矿务

公司及青岛港。

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建于1898年，它的成立“并非仅以经济上的利益为目的，它在相当成份上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一方面它享有官方授予的发行货币之权，这种货币被特定为胶济铁路客货运结算的支付凭证。它还开展承担青岛对外贸易的所有外汇兑换和关税存储支付等专项业务；另一方面它又秉承殖民当局旨意，组织银团投资于山东的殖民开发，为德帝国在山东的扩张不遗余力地筹措资金，实际上扮演着德国国家银行的角色。

德华银行青岛分行投资的最大项目是以5400万马克组成德华山东铁路公司（其中华资仅占10万元，但仍以合办名义欺骗世人——笔者注），开筑胶济铁路。1904年6月该路全线通车后至1913年的正常营运期内共完成客运量8127078人次，货运量5567734吨。德国进口青岛的80%货物是通过这条铁路输往内地的，该路为德国殖民者获利3375万马克，相当其投资额的62%。^⑦

德国还在1908—1910年期间，以63%的股份额与英国一道投资795万英镑承筑了津浦铁路，德国包揽了天津至徐州段的修建工程，据此获取了该路的用人权和续借款权。这两条铁路的铺设，使德国殖民者以青岛为基地，以济南为中转枢纽，向山东进而华北腹地呈梯状纵向联结的扩张企图得以初步实现。

德国驻沪领事曾宣称：“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所及之处。”紧随胶济铁路的开筑之后是山东采矿特权的兑现。德华银行再次获得政府特许，集资1200万马克，创建山东矿务公司，经营开发山东最大的坊子和淄川煤矿，^⑧其余各矿

因日德战争等原因未及开采——笔者注)自1902年8月坊子煤矿率先出煤以来,该公司充当了青岛能源的主要供应者,如他们规定公司应以低于青岛市价5%的优惠价首先满足海军燃煤,两矿在德国占领期间共出煤285.7万吨,矿业盈利627.9万马克⑧。1913年淄博煤销量的39.8%供给船舰和出口。(《淄博煤矿史》。

在各项大型投资项目中,名列榜首的是青岛港的建设了。在九年建筑期内(1898—1907年)共耗资5388万马克。除两座军用码头和一座石油、煤炭等散装码头外,新建的两座民用码头可同时停靠六千吨级货轮12艘,装卸能力为7.2万吨。此外耗资500万马克建成的造船所使修建船舶的设施趋于完备。由于较完善的导航航标与疏凌设备,使青岛港具备了全天候航运能力。当时青岛港拥有的150吨电动吊车和1.6万吨的浮船坞是当时远东最先进的港湾设施的标志。充裕的山东煤炭源源不断地供给了靠港船只的燃料,腹地那取之不竭的初级产品和海外商品那完善的供销渠道刺激着航运业的勃兴,每年领取德国政府559万马克航运补贴的汉美和北德两家轮船公司承揽了德华航运的主要业务。仅1900—1911年青岛港务时入就达628.2万马克,1913年德国对华贸易额的2%,约1.6亿马克是由青岛港完成的⑧。

构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销售市场的因素是多元的,从客观上讲,政权的保障,金融业的流通便利,投资环境的形成固然是先决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具备商品集散消纳的运销能力和能使生产者与交换者互惠的市场机制。这些客观条件具备得越完善,越便利,青岛的经济地位也就越突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如果说,港口的建立是德

国殖民者得以在青岛立足生存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铁路的开通则是向腹地经济渗透的重要途径。唯此，才能取代山东旧有的济南、芝罘等传统市场的地位，使山东的经济围绕青岛这一“主轴”而运转，德国也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宰”。

上述殖民开发的结果，使青岛具备了作为山东经济中心的各项功能，并据此向内地辐射扩散，“邻近各省中国富商源源而来，或购买土地，或建造房屋”，进行商业投资德国的礼和、顺和、哈喇、立中、禅臣、美最时、瑞和、捷远等洋行纷纷来此“安营扎寨”，追逐暴利。这二十余家德国商行的资金已高达2.09亿马克⑨成为垄断青岛经济的主导势力。

这一期间，还出现了一些主要是由德人创建的工业萌芽，其投资趋向多为附属于铁路，航运的修造业，进出口加工工业（如屠宰场）和迎合西方殖民者生活习惯的食品工业（如啤酒厂、汽水厂等），但与商业相比工业生产尚处萌芽阶段，所占比重其微，整个工业的投资热尚未形成。

总而言之，以商业贸易和运输为主导的青岛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使得1913年就在贸易总额（仅出口额较1899年增加119倍）和关税收入（较1899年增加了58.7倍）两大方面超过了芝罘和大连，成为位居天津之后的北方第二大港和带动整个山东经济的中心市场⑩正是德国自己不惜投资的殖民开发，青岛“一跃而为商业中心地，（官方）年可获五、六千万之利益”，这只远东列强关注下诱人的“金苹果”，所散发出的阵阵“清香”不能不使德国从它占领之日起就孕育下的列强争夺的种子萌发出新的恶果。